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 •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笔谈 •

（编者按）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过去 50 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关于中日关系，习近平强调，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50 年前，中国和美国结束长期隔绝状态，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日两国领导人也作出了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决断。以中美、中日关系融冰消障为标志，中国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对外关系出现全新局面。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打开外交新局面的战略决策本身就包括了开拓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而且顾名思义，改革开放包含“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而最初的开放对象主要是美、日等西方国家。中美、中日之间的破冰历程，美日两国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影响，无论大小，都应该为史家所记录。2022 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既从改革开放起步的宏观、整体视角观察 1972 年外交变局的历史意义，又分别考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过程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来启迪前行之路。

## 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

萧冬连

现有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考察，比较集中于国内政策的演进，对外部条件及其提供的可能性关注较少。然而，无论考察体制转轨还是经济增长，都不能离开对国际环境即战略机遇的分析。当然，所谓战略机遇期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取决于主观的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从全局看，改革开放几十年间虽然摩擦不断，但中国领导人成功地抓住了几个战略机遇期，埋头发展自己。本文将集中考察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国际环境，着重于这种外部条件的形成过程、变化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中国决策者对战略机遇的洞察、把握和利用。我们将会看到，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仅为中国利用外部资源推进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规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强化了高层的改革共识。同时，中国不只是一个“应变量”，还是重要的“自变量”，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可以以 1978 年的大规模引进为标志。当年编制长期现代化规划时，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共识：中国要争取时间，加快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并不难理解。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 20 世纪 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 156 个项目为基础，几十年来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 20 多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对此大体是清楚的。要想实现宏大的现

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sup>①</sup>。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sup>②</sup>。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恰好遇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当中国宣布现代化宏大计划时，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和热情<sup>③</sup>。很能反映这种热情的一个场景，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时受到的超规格礼遇。谷牧回忆说“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sup>④</sup>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亲自到机场迎接，或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驻华大使也提前回国迎接中国代表团，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各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欧洲共同体九国的经济实力与美、苏差不多，他们对美、苏矛盾很大，特别是对苏修又怕又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有利于我们争取欧洲，团结反霸。经济上有利于我们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在听取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sup>⑤</sup>这是过去不曾有的有利形势。

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表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里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应当追溯到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当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伊始，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中美两国随即经历了“20年长期交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战略孤立和遏制，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非但如此，整个60年代，中美之间的对抗由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似乎再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依当时中美严重对抗的形势和两国舆论，人们很难想象短期内中美之间有和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心打破坚冰走向和解，是富于战略洞见和外交想象力的重大行动。

最近，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说，50年前尼克松访华，美国人认为是自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情况也许正好相反，中国借与美国恢复关系进入了世界新秩序之中<sup>⑥</sup>。他此前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美国的“误导”<sup>⑦</sup>。其实，中美和解不是哪一方的单方面需要，而是两国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尼克松、基辛格的所谓“缓和”战略推动了中美和解进程，而毛泽东、周恩来则敏锐地洞察到并抓住了这一机遇。60年代末，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相对衰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苏联趁机发动战略攻势，美苏全球争夺渐显“苏攻美守”态势。这迫使尼克松政府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亚洲收缩政策。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脱身，同时利用中苏分歧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对中国日渐上升的国力以及未来巨大潜力的重视，

①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2004年印行，第90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6、228页。

③ 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

④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⑤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126页。

⑥ 《白邦瑞 & 文斯·凯布尔：我们以为是美国打开了中国大门，实际情况也许相反？》，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baibangrui/2022\\_04\\_04\\_633219\\_s.shtml](https://www.guancha.cn/baibangrui/2022_04_04_633219_s.shtml)。

⑦ 《白邦瑞或任白宫中国事务顾问 曾称中国战略忽悠是毛泽东发起的》，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6\\_11\\_25\\_381876.shtml](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6_11_25_381876.shtml)。

也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尤其在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以后，美西方很多人认为“长期孤立中国比承认中国更加危险”。美国还隐含一个长远意图，即希望以经济和人员交流等手段，将中国拉向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一边。<sup>①</sup> 而在中国，自6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从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以后，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的判断得到确认，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在降低，毛泽东、周恩来也在捕捉中美和解的可能性。从1969年6月开始，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陈毅则直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sup>②</sup> 陈毅等人的研判和建议支持了毛泽东正在酝酿的新构想，即超越意识形态羁绊，重新定义中、美、苏战略关系，这为中国调整对美战略提供了依据。

中美关系解冻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上的好处。美国学者达莱克（Robert Dallek）说，美国“从中获取的最大好处就是对苏联产生的有利作用”，是“遏制莫斯科的有效方法”<sup>③</sup>。对中国来说，中美和解最为重要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减轻自身的战略安全压力，而是为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历史契机。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长期被排斥于各国际组织之外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这主要是联合国内部力量消长的结果，但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的发表应该也影响了相当多国家的投票意向。中美关系解冻，直接推动了中国同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英国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5月，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加上此前与法国（1964年）、加拿大（1970年）建交，中国与西方关系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者接受美国援助、受到美国压力、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纷纷排除障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7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新一轮建交高潮。从1971年到1980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55个增加到124个<sup>④</sup>，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孤立封锁的局面开始被突破。公道地说，中国通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1978年8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二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关键是中美建交，从1972年到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趋于停滞。当时美国外交的重点是美苏而非美中，它所关心的是在与苏联竞争和谈判中打“中国牌”。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原则是三条——断交、废约、撤军。美国迟迟不愿走出这一步，直到1978年才开始作出政策调整。其主要动力是什么呢？是苏联对外扩张造成的战略压力。这是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的契合点。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因素起作用。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那就是美国坚持继续对台出售武器。最后是邓小平拍板，把这个问题留到建交以后处理。当时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sup>⑤</sup> 现在有人把台湾问题归咎于邓小平当年的让步，这是缺乏历史感的。即使不如此处理，台湾问题也仍然在那里，不会有丝毫改观。而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敢拍板，中美建交的最好时机就可能因此错过，中国的改革开

① 参见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3—18页。

②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1992年6月）。

③ 转引自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④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406—408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7页。

放和现代化发展将是另一番图景。

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一条线”的战略设想。然而他在世时，这个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联美抗苏”的统一战线。特别是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中美和解促进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尤其体现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隔绝甚至敌对状态。东南亚是华人华侨主要集聚地<sup>①</sup>，然而华人华侨问题反而成了双边关系的“负资产”。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利用华侨和国内共产党游击队颠覆他们的政权。东盟六国中的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甚至加入了美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这个组织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同马来西亚（1974年）、菲律宾（1975年）、泰国（197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对这些国家进行访问。其中，中国同新加坡虽未建交，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80年代初，中国抛弃过时的世界革命理念，停止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以全面改善。随着同美国建交和恢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逐步从国际体系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到1986年底，中国已进入政府间多边外交的几乎一切重要领域，参加了近400个国际组织，批准加入了130余项国际公约<sup>②</sup>。

## 二

在经济上，通过恢复和发展同美西方的经贸关系，中国开启了进入世界市场，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长过程。

冷战时期，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1950年1月，以美国为首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52年9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特殊管制，在“巴统清单”之外增加207种物资，形成了“中国特别清单”，严于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控。新中国成立之初，除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中立国家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52年起，直到50年代末，相关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sup>③</sup>。对外技术引进也全部来自苏联东欧，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

客观地看，即使在冷战形势严峻的50年代，与西方国家做生意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当时香港、澳门是内地对外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利用这一渠道从西方国家买进了某些“禁运”物资<sup>④</sup>。为了打破封锁，从1957年4月25日起，中国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吸引外商来华。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sup>⑤</sup>。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为了自身

① 20世纪50年代初，90%的世界华侨华人居住在东南亚。70年代以后，华侨华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格局才发生决定性改变。参见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② 《当代中国外交》，第326页。

③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④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19页。

⑤ 《从广交会到消博会：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中国贸易新闻网，<https://www.chinatradenews.com.cn/content/202107/02/c135256.html>。

利益，1957年5月，英国率先宣布放松管制，取消了巴统规定的对中国的额外出口限制，随后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区别政策，1954年8月12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sup>①</sup>。特别是对日本，中方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推动双方贸易往来，1964年、1965年先后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在未建交的状态下把贸易关系提升到半官方性质。<sup>②</sup>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贸易额急剧下降，到1965年时只有4.1亿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9.6%<sup>③</sup>，对外贸易整体萎缩。这迫使中国把进出口贸易重点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向其引进急需的技术设备，中国的外贸格局由此悄然改变。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外贸总额中的占比，已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sup>④</sup>。60年代前期，为解决“吃、穿、用”问题，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次引进的规模很小，但有突破性意义。然而，这种经贸往来特别是对外引进受到美国严格限制，美国一直不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直到1970年，中美贸易额仍然为零<sup>⑤</sup>。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情况开始变化。出于“缓和”战略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开始放松东西方贸易管制<sup>⑥</sup>。中国抓住机会，逐步开展对美贸易。1972年春秋两季广交会，先后邀请了30多名和150名美国客商与会。在秋季广交会上，中国直接从美国进口成交约1.5亿美元，其中包括10架波音707飞机、40台飞机发动机、4套人造卫星通信地面站等技术产品。<sup>⑦</sup>中美双边贸易额到1978年达到9.9亿美元<sup>⑧</sup>。1973年对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即所谓“四三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1972年至1977年，中国同西方十几个国家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有较大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增长2.7倍，年均递增24.1%。<sup>⑨</sup>陈云在1973年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他认定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sup>⑩</sup>

有学者认为1973年的“四三方案”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样说也无不可，不过当时只是开了一个小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没有结束，稍微大胆一点的想法都会受到极左派干扰，国内并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1978年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度，外贸依存度只有9.8%，人员交往更加稀少。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53年的1.23%下降到0.75%，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sup>⑪</sup>。

对外开放的真正起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是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历史性契合。国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② 参见牛建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

③ 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

④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27页。

⑤ 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⑥ 参见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⑦ 紫丁：《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3、307页。

⑧ 刘磊、于婷婷《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

⑨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32页。

⑩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218页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06页。

⑪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34页。

内政治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的宏大计划<sup>①</sup>，并向外界传达了扩大对外引进的政策信号。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各国，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sup>②</sup>，甚至出现相互竞争的态势。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中日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后，对西欧人影响很大，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sup>③</sup>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也对记者提到这件事，他说：“欧洲的朋友问我：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sup>④</sup> 西欧的积极性来自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在战略和政治层面，正如上文所说，中欧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重的形势。在经济层面，受石油危机影响，世界市场不景气。世界贸易增长率从1975年的11.5%，依次下降为1976年的11%，1977年的6%，1978年的4%<sup>⑤</sup>。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产品、技术、资本过剩，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急于找出路<sup>⑥</sup>。一方面需要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需要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sup>⑦</sup> 这一波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而大量国际游资的存在则为中国解决庞大的外汇需求提供了可能<sup>⑧</sup>。双方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的互补性需求，中国太过落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与美西方形成竞争关系。这让中国决策层看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尽量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sup>⑨</sup>。

所谓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欧、日的开放，邓小平多次明确地说到这一点。1985年11月22日，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sup>⑩</sup> 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又是关键。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引擎，并主导着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制约其盟国向中国出口技术。1978年底，邓小平为中美建交最后拍板，经济上的考虑占有相当的分量。中美建交有利于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80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该协定，但要求对华最惠国待遇需一年一次经国会审核批准。尽管如此，《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仍然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1979年至1980年间，双方签署了35个有关科学技术合作、航海、贸易等方面的双边协议<sup>⑪</sup>。美国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限制也有所松动。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在

① “十年规划”是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讨论通过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二十三年设想”则是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的一部分（“十年规划”也是在该《汇报要点》基础上形成的）。

② 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这表现了他们解决资金过剩问题的急切心情。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

③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1页。

⑤ 参见宦乡：《纵横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1—22页。

⑥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

⑦ （韩）朴贞东《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⑧ 1978年，中国签订了包括22个大型项目在内的78亿美元成套引进项目合同，而当年的外汇储备只有1.7亿美元。参见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1页。

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4页。

⑩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96页。

⑪ 参见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18、21—22页。

与德、法、英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我们已表示不反对西方在对华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sup>①</sup>当然，美国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幅度仍然十分有限。也正因为这样，在诸多利用外资的方式中，邓小平更倾向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这样做，一方面能够缓解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总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发挥了特殊作用。1978年2月，中国率先同日本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并从日本引进了宝钢项目，在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带领下，有1000个日本公司参与了宝钢工程建设。从1979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援助的国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使日本部分高层心存感激，双方达成一个默契，以ODA的方式代替战争赔偿。<sup>②</sup>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向日方表达了希望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意愿，日本作出了积极回应。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访华时决定“今后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合作”。1980年3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对美国记者说“日美把力量合起来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极为重要的。”<sup>③</sup>自1981年至1986年，日方先后派出专家900余人次来华，为中国190多家企业进行“企业诊断”，包括轻工、纺织、化工、机械、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如日本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派员到北京内燃机总厂传授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简称“TQC”）的经验和做法。稻山嘉宽、河合良一、大来佐武郎等一批日本人对中国现代化的热心超出了单纯的利益考虑。北京内燃机总厂厂长沙叶回忆说“我觉得他们是抱着一种高尚的态度，免费甚至自费做这件事，不单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更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sup>④</sup>这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当然从根本上说，对华援助符合日本的基本国策，战后日本长期推行“经济外交”，以对外开发援助为先导，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

中国对外开放还有一个特殊资源，那就是众多的华侨华人。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约2000余万人<sup>⑤</sup>，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早已为世人所瞩目。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立即推动侨务政策调整，打破所谓“海外关系”的政治壁垒，推动境内外华人之间的联系。在此之前，“海外关系”被视为敌特嫌疑。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五位著名工商界人士共商对外开放大计，希望他们在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sup>⑥</sup>请荣毅仁出山办实业，也是借助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影响力。此外，中国还拥有香港这个自由港。今天回过头来看，1949年解放军逼近香港时决定“暂时不动香港”，1960年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香港不仅成为内地在封闭环境下与外界交往的窗口，在启动对外开放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就是看重其毗邻香港、澳门和华侨众多的条件。

开放之初，在西方财团还在观望之时，率先进入的是华商资本。他们既有报效乡梓的愿望，又有血缘、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在1982年底以前最早创办的48家合资企业中，属于华侨、华裔、

---

①（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等译《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67页。

② 40年3.6万亿！日本将于3月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23621](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23621)。

③ 《日美应联合起来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参考消息》1981年3月30日。

④ 转引自日本广播协会（NHK）纪录片《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

⑤ 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1页。

港澳商人投资的共 28 家，约占 60%<sup>①</sup>。进入 4 个经济特区的也主要是港资。1983 年底以前，外商在 4 个经济特区开办的 37 家独资企业中，除了 1 家来自美国、1 家来自新加坡，其他 35 家全部来自香港<sup>②</sup>。80 年代，香港超过 80% 的生产线，包括 90% 的玩具和 80% 的服装、塑料、皮革、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以珠三角为主的内地，形成以内地为“后厂”、以香港为“前店”的空间布局，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其次是东南亚华商。从 1981 年到 1985 年，东盟国家对中国投资 6 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据当时新加坡报纸报道“自去年（1984）以来，新加坡商人积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平均每月至少有两个项目与中国达成合资协议。”泰国报纸报道，1981 年至 1984 年底，中泰共签订了 15 个投资协议，华商正大集团就是代表之一。<sup>③</sup> 早期华商大都是小规模投资，但正是这些中小投资的开拓，后来在闽粤地区形成了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激活了地方经济。相当长时间内，东南亚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市场。40 年来，侨、港、澳企业约占中国外资企业总数的 70%，其投资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60% 以上。正如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所说，“海外华侨华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最天然的‘粘合剂’”。<sup>④</sup>

### 三

国际环境相对友好，也为中国高层大规模出国考察，以客观的眼光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可能。1978 年的出国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可能是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考察潮。这种考察从 1977 年就开始了<sup>⑤</sup>，1978 年形成高潮。出访对象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各级各类出国考察团不胜枚举<sup>⑥</sup>。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 1978 年 1 月到 11 月底，仅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有 529 批，共 3213 人<sup>⑦</sup>。可见当年高层对于了解世界的急切和热情。起初，出国考察主要是为了引进项目；到了 1978 年，则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1978 年 2 月 16 日，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sup>⑧</sup>。6 月 3 日，华国锋在听取赴日访问团和赴港澳考察团汇报后，要求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包括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目的是开阔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sup>⑨</sup>。1978 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共有 12 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 20 次访问了 51 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 2 次、4 个国家，邓小平出访 4 次、8 个国家。这些国事访问有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各国的发展经验。邓小平对新加坡和日本的访问尤其专注于此。

① 汪一鹤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第 94 页。

② 《中国经济年鉴（1984）》，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 年，第 XI-74—XI-75 页。

③ 周中坚《80 年代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东南亚研究》1987 年第 4 期。

④ 《王辉耀：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与世界的天然“粘合剂”》，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8/09-10/8623759.shtml>。

⑤ 从 1977 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轻工业部派人去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考察；地质部派人去法国、联邦德国考察；农业部派人去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日本考察；冶金部派人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考察；石油部派人去美国、日本考察；国家经委派人去英国、法国、日本考察；等等。参见曹普《改革开放前夕大规模出国考察潮》，《党史文苑》2018 年第 4 期。

⑥ 其中较多被提及的有李一氓等率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林乎加率经济代表团访日，段云率经济贸易代表团考察港澳，还有袁宝华率经济代表团访日等。最重要的要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在 36 天时间里考察了 25 个城市，80 多个工厂、矿山、农场、港口码头、大学和科研单位。

⑦ 曹普《改革开放前夕大规模出国考察潮》，《党史文苑》2018 年第 4 期。

⑧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33 页《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三）》，《百年潮》2002 年第 11 期。

⑨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118 页。



中国封闭了 20 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和文化交流工作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 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世界。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sup>①</sup>。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sup>②</sup>。这些国家之所以快速发展，有许多经验是相同的，例如：他们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对于国外的情况，中国驻外使馆人员此前也是清楚的，但他们不敢把实情报告国内<sup>③</sup>。这次不同，各出国考察团如实向国内作了汇报，高层也急切地想听到真实情况。聂荣臻在听取谷牧汇报后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sup>④</sup>邓小平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sup>⑤</sup>1978 年 9 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sup>⑥</sup>。出国考察凝聚了高层最初的改革共识。

如果说 1978 年还是出去看看、开阔眼界，那么 1979 年以后出国考察的目的性和专业性就更强了，那就是为探索中国体制改革提供国际借鉴。各类考察团络绎不绝，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对日本、美国、联邦德国、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综合考察。中美建交后，对美国的考察加强了。1979 年 10 月和 11 月，中国连续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先是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美，接着是袁宝华、邓力群等率国家经委考察团赴美。1980 年 11 月至 12 月，又有以许涤新为首的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每个考察团的访问时间都超过一个月，与政府、国会、银行、公司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各界进行广泛交流。考察团对美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面评价，但着重点都放在学习借鉴上。中国尤其重视日本、联邦德国以及新加坡等国经验。日

- 
- ① 考察团发现，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工业生产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的高速公路形成了一个网络，其劳动生产率超出中国人的想象，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联邦德国一个年产 500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了 2000 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 16 万工人，相差 80 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 350 万吨钢只需 7000 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 230 万吨钢则需要 6.7 万工人，效率相差 14.5 倍。此外，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 40% 的谷物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 年卷），第 121—122 页。
- ② 1978 年 11 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归来后，到一些单位报告访日情况，对日本大为赞赏。他说，日本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多数家庭有汽车，家用电器完全普及。工人一年有几次分红，年终还有三个月的奖金。农民也穿毛料衣服。商店经营商品 50 多万种，而我们最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只有 2 万多种商品，“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没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同月，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了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 100 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 50 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用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访问结束时，驻英使馆的人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参见邓力群《日本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 年第 45 期；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 年第 2 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 年第 3、4 期。
- ③ 梁衡《1978 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北京日报》2018 年 10 月 8 日。
- ④ 《谷牧回忆录》，第 327 页。
-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32 页。
- ⑥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77 页。

本与联邦德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和崛起，新加坡则是战后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而且同为华人社会，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怀有浓厚兴趣。邓小平本人尤其重视日本经验，1980年3月31日，他在会见日本企业家访华团时说：“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sup>①</sup>

笔者在翻阅当年考察团的史料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氛围：来访方与接待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都淡化了意识形态差异，以务实和真诚的态度进行交流。接待方很乐意将本国经验介绍给来访者。1978年11月访日代表团成员张云方保存了一套日方为中国考察团认真准备的学习材料，非常详细，许多是手写的，有些材料当时还是保密的，这使他很感动。令他感动的还有考察团的学习热情，“大家都带着使命来的”。<sup>②</sup>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组织了十几位负责官员和经济专家（包括外相大来佐武郎），全面地介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情况和经验，并且详细提供了书面资料，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sup>③</sup>。国家计委外事局全部翻译整理，分两期刊登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

除了走出去，从1979年起，不断有国外经济界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学，办培训班，展开中外对话，为中国经济作诊断。举例来说，1978年底，中国政府聘请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为经济顾问，后来又增加了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庆瑞。他们多次应邀来华，大来佐武郎还促成了一年一次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是一个中日高层非正式对话，主要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行政策性的深入探讨。<sup>④</sup> 邀请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担任中国政府顾问，很能反映改革初期高层的开放心态。在80年代的对外思想开放中，世界银行发挥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先后写出两份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并出面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多次在中国或境外召开有关中国改革的国际讨论会，包括有名的1982年7月莫干山会议、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

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引发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即使过了40多年，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出国考察引起的思想冲击。其中有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过去讲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现在看它还很有活力；过去讲帝国主义阻碍技术进步，然而他们的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sup>⑤</sup> 讲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绝对贫困化也不符合事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许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只有对立，两者也有相通的地方，如计划手段并非社会主义独享，日、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运用计划，而西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活力，正是社会主义缺乏和可以借鉴的<sup>⑥</sup>。广泛的对外交流引发许多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市场化趋向的重要因素。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上），第613页。

② 《1978年袁宝华率队考察日本，学习科技技术》，凤凰网视频，<https://news.ifeng.com/c/87iLCq5Vq8d>。

③ 《访日汇报要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59期。

④ 魏众《改革初期的洋顾问》，《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

⑤ 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访欧回国后说：“按照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有新技术也不采用。（现在）看来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他们不是不采用新技术，而是拼命采用。”参见刘艳红《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党史博览》2020年第7期。

⑥ 在美国考察时，薛暮桥问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的印象。这位刚到中国访问过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地大人多，资源丰富，也已经有了有一定数量的技术设备，最落后的是经济管理”。薛暮桥表示：“这话对我印象很深。”宦乡说，一位美国学者称，美国每个社会细胞（指农工企业）是有活力的、有弹性的、有竞争力的，要它灭亡，也不那么容易。你们的社会细胞却是僵硬的、不活跃的，没有弹性，缺乏生存竞争能力。要想在两大制度竞争中取得胜利，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宦乡表示，这次谈话引起我很多的思考。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考虑改变社会僵化的趋势，要通过竞争来保持生命力。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关于国民经济现代化标志的座谈纪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06期。

## 四

通过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国际环境的考察，至少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第一，地缘政治的演变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为中国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能。其中地缘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到 1979 年中美建交，中国突破了自 50 年代以来被孤立封锁的局面，开启了进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为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政治平台。另一方面，经贸往来的互利性质使其具有独立的扩展动力。在一个平稳的国际体系下，经贸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的稳定基石。

第二，能否利用好历史提供的机会，取决于国内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取决于决策者对于世界大势判断是否准确。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cFarquhar）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评论说，没有 1972 年的中美和解，中国“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面临无法预测的更多的困难，成功的可能性极小”<sup>①</sup>。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当时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是战略安全，经济考虑尚在其次。有两个战略判断影响着对外部条件的利用：一是认为当时仍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备战吸引了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二是错估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陷入持久的政治运动的消耗之中。僵化的观念阻隔了对战后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会的认知，在对外经贸和利用外资问题上存在诸多禁区。真正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发展自己，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规划在国际引起强烈回应，而在国内，经历了一次全党范围的历史反思，许多禁区被突破，各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和工具陆续被采用。随后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体制逐步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体系。

第三，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一个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问题，特别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善于学习的能力。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点。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sup>②</sup>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即使遇到不友好甚至严峻的外部环境，也必须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努力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包括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4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超强的学习能力，尤其在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丢掉这条成功经验。毋庸置疑，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

第四，中国不只是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应变量”，同时应当是主动塑造国际格局的“自变量”，这在 80 年代成为一种自觉。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有一个新判断，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依据这个新判断，在对外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其主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不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是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对外战略调整的目标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争取一个持久和平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者。这个调整的核心是放弃自 70 年代以来推行的“一条线”联美反苏战略。80 年代初以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发动对苏“新冷战”。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虽然穷，但块头大，在世界政治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同任何一方结盟，反对另一方，都可能影响世

<sup>①</sup> 转引自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 年第 2 期。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1、132 页。

界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稳定。拉开一定距离，保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大三角”中独立的一角，发挥战略平衡作用，在同美苏打交道时处于灵活地位。<sup>①</sup>这次调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前提下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也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趋势。1989年，中国实现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在过去40年从来没有过的状况，当然是个好事。但也有另一面，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因此消解了，两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本文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 记忆与研究: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 章 百 家

1972年美国总统一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开始。50年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变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自身变化之大、变化之深刻，无论两国交往的广泛与深入，还是两国关系近期遭遇的困境，更是当时人们所难以想见的。如今，造就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们的远见、魄力、智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后人汲取。

#### 一、记忆中的尼克松访问北京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那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七，尚在春节期间。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恰是当时中美关系的写照。

尼克松的访问世界瞩目，在美国更是通过全程电视直播而引起轰动。然而，那几天的北京却是波澜不惊，气氛平静而略带一丝紧张。尼克松抵达时，并没有当年迎接友好国家领导人来访的那种盛大欢迎仪式。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他的到来并不那样令人惊诧，因为毛泽东在一年多以前就有所铺垫。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大约在1971年初，我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上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将毛泽东同一个外宾的谈话详细传达给基层的每一名干部群众，这还没有先例。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sup>②</sup>。事后想来，这次大范围传达无疑是提前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对中美关系可能的改变作出预告。但那时“反帝反修”的气氛浓厚，几乎无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只看作是伟大领袖的非凡气度与胸怀。由于“批陈整风”刚开始不久，人们更关注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所说的“四个伟大”很讨嫌。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参加友谊比赛，人们才猛然感到，中美关系真的要变了。

此后，形势变化之快出人预料。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后，中美两国政府宣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9、428页。